

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

——省社科界第十三届学术大会教育学与社会学专场综述

2020年1月6日,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南通大学承办的省社科界第十三届学术大会教育学与社会学专场在南通举行。来自省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聚焦理论热点,跟踪实践前沿,开展学术研讨,交流最新成果。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彭华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朱益明教授、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等专家在会上作主旨报告。

以更好的教育保障和改善民生

金陵科技学院王奋平认为,教育是“人民生活高质量”的重要内容。为满足新时代我国人民日益上升的精神文化需求,应发挥教育在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将教育发展融入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加大教育资源建设和供给力度,构建有利于公平、高效的教育发展政策体系,用科学的教育理念指导和规范教育实践。

南京财经大学汪栋、方静璇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政策支持指数与我国各阶段教育财政政策波动呈现出高度的吻合特征。政府部门应科学界定“有形之手”的合理边界,使其回归宏观调控

的本职职能;尽量削减或者控制不确定性因素,硬化教育财政预算约束,降低由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南京邮电大学金久仁认为,整体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应补农村教育之短板,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源投入;确定“支农”而非“离农”的价值导向;为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提供大体相当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和发展机会。

省社科院韩海浪指出,解决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义务教育问题,需要做好学龄人口预测和规划,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增学校扩学位,以公平为原则完善积分入学政策,提升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质量。

适应产业转型需要创新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大量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夯实产业发展的劳动力基础。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职业教育不断调整人才培养与办学模式,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江苏理工学院田真平认为,职业教育推动了农村三产融合进程,农村三产融合又反哺职业教育发展。应通过增强内生动力、差异化职业教育布局与专业结构、多渠道建设服务农村产业融合的职教师资队伍、构建区域协同的紧密型农村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等措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的顺利实施。

南京师范大学孙云志运用SWOT分析方法,梳理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优势因素、弱势因素、机会因素以及威胁因素,认为要发挥高职教育数量规模以及与区域经济融合等优势,抓住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破除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劣势以及消解高职教育发展外部威胁,推动高职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苏州市职业大学秦天程认为,在人工智能冲击职业选择的背景下,高职学生专业认同度低的实质是“机器换人”而导致的学生对自身技能的信心不足。处理复杂工作模式的技能而非传统的熟练型单一模式的技能,才是适应智能化工作发展趋势所需要的技能。应尊重学生自我导向的学习,保障智能化、个性化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参与技能发展和学习标准的设计过程,注重发展性评价,利用EDM实现对学生成长的评价。

推进社会治理结构变革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衡的问题愈加突出,社会矛盾日益频发,社会冲突风险不断扩大,社会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南京财经大学詹国辉等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治理正面临着结构性流变之风险,社会治理的转型已成为重要现实命题。社会治理从传统模式向新模式转型的行动逻辑,是从“政府质量”转向到“社会质量”。前者强调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指标的递增,而后者则凸显社会福祉的提升。因此,应建构“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的社会治理内容体系,坚持基层党

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核心原则,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发展中的功能建设。

淮阴师范学院金华认为,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危机情境,单凭政府自身力量已经无法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应理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着力构建社会治理协同体系。在政府层面,树立正确参与理念、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在社会组织层面,规范内部治理、增强参与能力;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加强现代公民文化建设、夯实社会组织参与的社会基础,从而有序推进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进程。

南京工程学院刘朝认为,建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应按照“大公共安全”的思路,实现党的领导与多主体协同联动、统揽国家能力之治与社会事务之治、整合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协同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强化属地管理与区域联动、融通风险管控与应急处置,打造科学合理的一体化公共安全治理格局。

南京市委党校负菲菲通过对1000户城乡居民的收入问卷调查,分析测算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提出应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建设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制度全覆盖转向人群全覆盖,进一步做好社会保障扩面工作;聚焦低收入人口和经济薄弱村,社会保障支出重点向弱势群体倾斜;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保体系;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共建拓展,构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聚焦农村民生事业发展

淮阴工学院许加明通过对苏北刘村的田野

调查发现,空心村表现出全面“空心化”的困境。空心村问题可以从集中居住、政策扶持、土地流转、合作共治、文化复兴等五个方面综合发力,把空心村转变为实心村。

徐州工程学院张典兵运用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法,研究了徐州市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现状,针对政策扶持不够、储备性培育欠缺、资金投入不足、培育模式单一、师资队伍缺乏、评价导向有误等问题,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府制度供给,分类分层开展,多元并举,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等系列举措。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黄凯东探讨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研究表明,仲裁解决纠纷成本低、仲裁适用主体更宽泛、仲裁程序比较规范。切实发挥仲裁制度的作用,应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性质,淡化仲裁行政属性;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设置,提升仲裁人员素质;构建仲裁与调解结合、仲裁与诉讼衔接良性互动机制;确保仲裁裁决执行到位,维护制度权威。

(南通大学人文社科处 孙泊、邹冬梅、吴寒飞)

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 机遇 挑战 路径

——省社科界第十三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综述

2019年9月22日,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省老年学会专家委员会和青年委员会承办的省社科界第十三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机遇、挑战和路径”专场在河海大学举行。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河海大学副校长张兵、省老年学学会会长施国庆等参加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机遇、挑战和路径”这一主题展开广泛研讨,共享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

研究及管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探索加强包括学会、协会等学术团体在内的学术共同体的合作与交流,以期提升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水平,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智力支撑。

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质及演化趋势

老龄化研究并非中国的本土概念,而是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省社科院马岚提出,在老龄化研究学术史上,法国人口学家皮撒的研究报告开创、奠定了研究老龄问题的知识体系和

话语体系。1982年召开的世界老龄大会将中国这一当时“没有老龄问题”的国家拉入到国际老年叙事框架中。可以说，中国老龄化的“启蒙”过程是一种被动的卷入与回应。中国老龄化概念虽然具有“舶来”性质，但这种舶来并非标准化地“照搬”或“复制”，而是形成了一套中西结合的“杂糅体系”：既认可、接受西方国家在老龄化未来形势和影响上的“问题化”倾向，同时又不断重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年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尊老敬老的文明风尚。“问题化”与“尊老敬老”的双重定位将深刻影响后续养老服务社会工程的构建、新型养老模式的塑造以及具体的养老服务实践。

政府、社会、学界对当前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形成一定共识。省社科院张春龙提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出生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逐步加深的状态。江苏是全国老龄化较为严重的省份，一方面正步入深度老龄化，另一方面人口出生率却持续走低。为避免陷入“低生育陷阱”，江苏必须采取积极鼓励生育二孩的举措，构建鼓励生育的政策体系，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来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在延迟退休方面迈出更大步伐。河海大学王欢指出，生育政策调整和退休年龄延迟可以缩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缺口，前者作用持久但水平低，后者作用显著但具有阶段性，联合政策实施则效果最为突出。

有学者指出，中国健康老龄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南京大学郭未等提

出，在区域层面，中国的健康老龄化呈现“胡焕庸线”式分化，即由东向西以渐弱的方式扩展；在省际层面，各省之间差异较大，靠后的省份与前列省份绝对值之间有接近一倍的差异。南京师范大学黄润龙提出，老年保障水平存在人群差异，农民群体的受保障程度有待提高。

与会学者还对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因素、相关服务的供需不匹配现状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南京邮电大学孔维维和周晶晶提出，家庭结构对老年健康有着异质化影响，与配偶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指标具有双面效应。社会信任对老年人健康有显著积极影响，社会文化娱乐参与在社会信任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杜丽娜认为，肿瘤科病人及家属的临终关怀需要较强烈，但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较低，临床医护具备的对应知识与技能也较为缺乏。

基于CSSCI数据库，河海大学常亚轻和黄健元对1998—2018年老龄化领域的1867篇文献进行了梳理，通过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的分析，提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整合服务资源及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等主题将成为老龄化研究热点，并将老龄化领域的研究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人口转变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技术鸿沟”
在信息化社会，科技支撑是解决民生和治

理问题的重要依托。构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既是缓解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带来的养老服务供给压力的有效对策，也是解决居家养老服务供求不均衡、不匹配的必要之举。然而老年群体对智慧养老服务产品普遍存在使用上的“技术鸿沟”，这是建设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河海大学张鑫、尚哲从智慧养老与养老服务需求的契合性出发，分析了当前智慧养老服务发展中存在的机制性障碍：政策指导缺乏系统性，标准化建设不足，供给与需求链不匹配等。南京邮电大学舒星宇和周建芳调研发现，南京市老年人使用智慧养老产品的比例很低，而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只有31.6%，利用智能手机或者网络养老服务的比例则更低，使用过的一些智慧养老产品多为一些简单、方便、容易操作的健康保健型产品，如血压计、血糖仪等。40%以上老人反映缺乏系统学习的渠道，尤其是打字操作及辨别信息真伪。针对上述现象，有学者乐观表示，目前老年人对智慧养老产品的使用程度虽然不高，但他们对智慧养老产品的功能抱有热切期待。政府、企业和社会在未来智慧养老服务的政策措施、系统建设和养老产品开发层面应大有可为。

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积极之策”

与会学者提出了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政策建议。在健康养老政策层面，医养结合模式受到了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医养融合是实现医疗、养老机构优势互补的有效途径，“老有

所养、养中有医”是理想状态。东南大学张晶晶和张肖敏分析了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在整合医养相关资源、递送医养服务时的行动策略和角色定位，认为非营利组织可以更好地发挥整合者和链接者角色，促进医养服务的资源整合、人才整合和供需对接，将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模式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公益性、保障性与市场化特点的混合式服务体系。

情感慰藉、临终关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老龄化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河海大学江天河和孙海涛建议，社区养老研究、养老政策制定不能忽视社区内的情感互动，应探索实行生前预嘱制度，生前预嘱制度的法理基础是个人对自身医疗决策的自我决策权。在不少老年患者并不愿意沦为“医疗技术的囚徒”的情况下，生前预嘱制度能满足部分老年患者的需求，同时有助于释放有限医疗资源、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尊重当事人自我决策权和重视生命质量。

南京农业大学赵晶晶和李放认为，外出务工经历通过经济收入的增加效应和代际关系的削弱效应，能够间接促进农村老人接受现代养老观念，从而提高农村老人选择社会照料的可能性。河海大学顾金土和余佳琦提倡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即“下乡抱团养老”。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施漪旎)

新中国70年意识形态建设的 历史经验与实践发展

——省社科界第十三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综述

2019年11月7日，省社科界第十三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新中国70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实践发展”专场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江苏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论文获奖代表、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代表近200人与会并展开研讨。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重大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坚定信仰、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信念的旗帜，是党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团结群众的旗帜，是党开展斗争、夺取胜利、激励士气的旗帜。随着时代发展，意识形态在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外交领域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包括政治领域的保障力、经济领域的引领力、文化领域的守护力、外交领域的影响力。与会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从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舆论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等多个切入点发表观点。

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提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引导和管理。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长王永贵教授认为，无论回望过去还是展望未来，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问题、战略问题，也是科学问题、学术问题。

70年意识形态工作取得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与会学者认为，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南京师范大学何美认为，审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历程，凝练其中的主要经验，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波澜壮阔历史的最好纪念。南京晓庄学院余守萍和南京师范大学王东均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

的经验，重点揭示人民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表现。南京中医药大学豆勇超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归结为三大特征：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批判性与包容性相统一。

与会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集成一个整体，改变了过去松散、随机的情况，形成一种合力。在学术理论研究上，意识形态研究的学理性也较以往有了大幅提升。从现实来看，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出现新特点，意识形态交流交锋呈现新态势，话语权斗争领域也发生新转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功能提升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思想分殊的蔓延、世俗趣味的高涨、网络逻辑的渗透等。种种问题，必须在进一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的过程中主动应对和化解。

注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和学术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与会学者认为，要围绕重大理论热点，扎实开展学习、宣传、研究、阐释工作，围绕各自的学科领域找到研究的切入点。

近年来，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和运转方式，意识形态研究要勇于探究网络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抢占网络阵地“制高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交锋角逐的新阵地，在为意识形态发展提供重要机遇的同时，也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发起了严峻挑战。当前要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建构，切实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等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

有学者提出，新时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定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文化消费主义等错误思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殷文贵在分析文化消费主义中国样态的基础上，分别从文化消费主义的生成根源、存在形式、价值导向、根本目的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阐明文化消费主义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基地 尤文梦 张海防）